

CSSCI来源集刊
总第16辑
2009年冬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国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SSCI 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总第 16 辑

主编 / 张宪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研究. 总第 16 辑/张宪文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97 - 1363 - 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
民国 IV. ①K25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609 号

民国研究 (总第 16 辑)

主 编 / 张宪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马 爰

责任校对 / 崔雪梅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 75

字 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63 - 1

定 价 / 39.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名单

中国内地（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张宪文 张 磊 李文海
李 玉 汪朝光 陈红民 陈谦平
茅家琦 金普森 姜义华 徐思彦
崔之清 章开沅 谢俊美

港台地区（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玉法 梁元生

国 外（以中文笔画为序）

久保亨〔日本〕
方德万（Han J. van de Ven）〔英国〕
罗梅君（M. Leutner）〔德国〕
柯伟林（W. C. Kirby）〔美国〕
高念甫（Andrei N. Karneer）〔俄国〕
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意大利〕
裴京汉〔韩国〕

主 编 张宪文

执行编委 陈谦平 李 玉 徐思彦

目 录

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 熊 斌 / 1

国民政府社会救济立法研究

——以 1943 年《社会救济法》为中心 岳宗福 吕伟俊 / 30

抗战胜利后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陆和健 / 42

经济史研究

论爱国实业家刘鸿生的经营理念 史全生 / 62

试论抗战胜利后中国学界的市场经济观 卫春回 / 77

人物研究

从政治录用的视阈看兴中会与同盟会时期

孙中山的领袖角色 李 玉 / 95

袁世凯与辛亥政局的演化 丁 健 / 111

1942 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 段瑞聪 / 125

政治与文化研究

民国初期的无政府主义

——以师复的思想为中心 嵯峨 隆 / 146

时代思潮的地方回应

——舒新城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仲民 / 162

由训政到宪政：向民主统治形态的过渡 金子 肇 / 184

研究综述

日本的民国史研究与民国史论会 久保 亨 / 196

域外论点

粤港与上海的异势与互争：1842 ~ 1949 陈明 録 / 210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Social
Darwinian Context, 1895 – 1925 Bu Liping / 215

稿 约 245

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北京各团体 国民外交联合会

熊 斌*

巴黎和会后，各国之间矛盾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远东，英美日争夺更趋激化。为协调各国矛盾、避免大规模冲突，美国倡议发起华盛顿会议。1921年8月11日，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8月16日，北京政府宣布接受，希望借此实现：“（一）取消英日同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①因虑及华会对中国的重要，中国社会各界纷纷成立国民外交团体，冀望实现中国的独立。北京各国民外交联合会即在此背景之下而成立，并逐渐在华会前后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据笔者所见，学界对联合会的关注仅散见于零星文章之中，如文心在《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一文中就选辑了关于联合会沿革、宣言、通电、两次大会纪事、规约等情况，但属于史实的静态罗列，忽视动态因素的分析。另外，周斌《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来新夏《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民众运动》（《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陈廷湘《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以及邓思敏的硕士论文《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1921.6~1922.2）》（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8月）也对此均有所涉及，但大都属于行文之时顺带提及，并未就此作专题展开。本文根据《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刊，考察北京各团体国民

* 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 《极密电——施顾王代表》（1921年10月31日），《外交档案》：03—39—003—03—006，引自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62页。

外交联合会的成立缘由、组织、活动情况及与南北政府的互动关系，重点梳理联合会抵沪代表与其他省市代表在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中的分歧冲突及其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

一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的成立及其组织

鉴于华会关系中国甚重，北京各界纷纷成立研究华会团体予以密切关注，这些团体具有“我不自谋，人将谋我”^①的危机感与责任感。因关注重点的不同，各团体旨趣各异。叶恭绰、陈振先、郑洪年等组织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特邀专门学者讨论，以研究华会“我国应取之态度、应提之方案、应执之手段为宗旨”。^②北京旧国会议员组织的太平洋会议问题商榷会提出：“按之法律，质之天良，均有责无旁贷之势，务望共同讨论，积极负责，为严重之监督，作外交之声援。”^③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蒋梦麟、马叙伦发起的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则“从学术方面研究太平洋问题，及发表关于太平洋各问题之意见，惟均以学识为根据，如人选问题等有涉及政治范围者，概不在研究之列”，^④侧重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为太平洋会议提供參考，与国内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北京大学也发起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⑤与北京政界交往甚密的周树模、李景觐等人联络在野各派组织成立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邀请新旧国会议员、欧美留学生及各省各会优秀分子加入，以研究“我国应取之态度及方策及因此关系所发生之各项问题为主旨，并征集全国之意见，协定平允之方针，以对外一致之精神为此次会议之后援”。^⑥在野名流汪大燮、孙宝琦等组织华盛顿会议后援会，旨在“援助我国外交，并鼓励我国赴会代表”，务求诸问题“皆得惬意之解决”。^⑦政客王渐槐等成立中华外交协会，表示：“我国民不得不未雨绸缪，先为精辟之考虑，期博我国外交史上之光荣，集思广益，众志成城。”^⑧

① 《国内研究太平洋问题各团体之进行》，《晨报》1921年8月10日，第2版。

② 《讨论太平洋问题之新团体》，《申报》1921年8月2日，第3张（11）。

③ 《国内研究太平洋问题各团体之进行》，《晨报》1921年8月10日，第2版。

④ 《京学界与太平洋会议》，《申报》1921年8月24日，第3张（10）。

⑤ 《北大学生继起组织讨论会》，《晨报》1921年10月3日，第2版。

⑥ 《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将成立》，《大公报》1921年8月25日，第2张。

⑦ 《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宣言》，《申报》1921年9月4日，第3张（11）。

⑧ 《北京又有国民外交团体出现》，《申报》1921年10月7日，第3张（10）。

因成立关注华会团体日渐增多，北京各界担心“惟各行其是，将来难免意见分歧，而招不一致之害”，各团体为此特派代表“分头接洽，拟组织联席会议，以图意见之一致”。^①在联络沟通之下，9月14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开会，与会代表均认为有联合之必要。^②六天之后的9月20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就宣布成立。据统计，先后加入联合会的团体达七十余个。^③10月1日，联合会在中央公园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公推蔡元培为主席，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接受李景觐的建议宣布加入联合会。^④在会上，执行委员兼会务主席李景觐报告联合会成立及经过情形及两次代表会议所议决的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及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两案，并报告两案付大会讨论，后一致议决对于鲁案直接交涉予以坚决反对，并表示会坚持到底。后大会推李景觐与蔡元培、王家襄、李煜瀛、张耀曾、张鲁泉、李家鳌、钟少梅、顾澄、钱用和等十人赴外交部说明反对直接交涉之意。^⑤为形成全国性的一致对外，联合会早就在讨论成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事宜。^⑥联合会以“集合国民公意，对于外交问题为一致之主张及行动”为宗旨。会议分代表会议与全体会议两种，代表会议由各团体代表组

① 《各团体联合会议已成立》，《晨报》1921年9月16日，第2版。

② 《北京太平洋会各团体之联合》，《申报》1921年9月19日，第2张（7）。

③ 具体情形如下：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太平洋会议国民后援会、太平洋会议法律问题讨论会、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自决会、太平洋协会、太平洋问题熟商会、第一届国会议员太平洋问题商榷会、第二届国会议员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中国学生远东问题研究会、铁路协会太平洋会议铁路问题研究会、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外交共进会、国际联盟同志会、国际问题讨论会、中华外交协会、天津远东问题研究会、福建旅京华盛顿会议后援会、赣学会附设太平洋会议研究委员会、国民大会商榷会、全国和平联合会、银行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总商会、北京教育会、京兆农会、北京各界联合会、地方自治协进会、地方制度研究会、京兆自治研究会、京都自治筹进会、京师地方公益会、湖南旅京民治促进会、旅京鄂人自治期成会、鄂事平治会、福建自治讨论会、两湖善后协会、福建善后协会、京兆同乡联合会、湖北旅京同乡会、江西旅京同乡会、福建旅京各县联合会、山东旅京各界代表会、满族同进会、回教俱进会、基督教救国团、公教会、劳动救济会、民生协济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北京报界联合会、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中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私立中小学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女学界联合会、旅京河南学生联合会、东三省旅京学生联合会、福建旅京学生联合会、湖南旅京学会湖北旅京学会、华侨旅京学会、政治研究会、教育协会、教育维持会、群学会、学术研究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小学教育改良会、新中国同志会、留学同志会等。参见文心选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第7、39页。

④ 《昨日外交联合大会之盛况》，《晨报》1921年10月3日，第3版。

⑤ 文心选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第7页。

⑥ 《北京国民外交联合会成立纪》，《申报》1921年9月24日，第3张（10）。

织，规定“凡加入本联合会之团体得推代表三人出席代表会议，但每一团体只有一表决权”，代表会议“非有加入团体过半数之出席不得开会，其会议事件以出席各团体多数决定之”，对外宣布议决事件时“以本联合会名义行之，并由赞成各团体副署”，且“应以文书通告未出席之团体，征其赞否，但得临时议决，限期答复，其逾期不复者作为默认”。每月开常会两次，但经一团体以上提议得开临时会议，会议主席由各团体轮流担任；全体大会则由代表会议议决召集，会议事件也由出席各团体多数决定，全体大会临时推举主席，所议决的事件以联合会名义进行。大会又设执行委员会执行事务、组织及办事规则，规定于必要时临时设置各项委员会。关于规约的修改，由一团体提议、十团体连署、经代表会议议决修改。经费一节，则由各团体分担。关于入会条件，要求甚为简单，规定：“凡赞成本联合会宗旨、愿加入本联合会者，得经本联合会审查委员会之议决加入之。”^① 10月13日，大会还对入会团体做出规定：“（一）担任联合会经费。（二）三次不到会者除名。”^② 此举实际上对各加入团体并未形成有效约束，当时会内各团体仍单独活动，仅是对外时以联合会的名义活动而已。

北京各团体及联合会，多由学界、政界、在野名流组织而成，官方背景浓厚。如梁士诒与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也组织太平洋研究会，力图“合南北要人为一炉，电询孙文陈炯明黄陂等，征求意见”。^③ 又如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由胡适、蒋梦麟、李大钊、马叙伦等学界名流组成。当时，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通电所附人员名单中有周树模、孙宝琦、陆徵祥、周学熙、萨镇冰、张謇、钱能训、王家襄、梁启超、周自齐、熊希龄、马良、陈锦涛、龚心湛、汪大燮、许世英、李登辉、王克敏、王正廷、饶汉祥、唐在礼、宋小濂、张国淦、聂其杰、刘揆一、钱崇固、冯耿元、邵振青、吴宗濂、江天铎、张海若、罗文干、张孝若、张弧、屈映光、刁作谦、丁文江、李景铄、叶景薪等，这些人大多位高权重，显赫一时。另一重要团体太平洋会问题讨论会的通电电文中，署名理事不乏当时名流，如叶恭绰、黄郛、黄炎培、陈垣、陈振先、王正廷、周贻春、刘展超、王宠惠、郑洪年、骆继汉、黄锡銓、朱启钤、张孝若、聂其杰、罗文干、梁士诒、张煜全、周自齐、汪有龄、冯耿光、刘景山、任凤苞、张元

① 文心选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第6页。

② 《国民外交联合会之会员资格》，《晨报》1921年10月15日，第2版。

③ 《梁士诒汪大燮组织太平洋研究会》，《申报》1921年8月13日，第3张（10）。

济、陆梦熊、张家璈、陶履恭、于保轩、李庆芳、刘垣、陈槐、刘柏生、夏校、关赓麟、李治东、王景春等。^① 部分人员履历如下：叶恭绰，举人，曾任清政府铁道督办，辛亥后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1912年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中华全国铁路协会会长、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及靳云鹏、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1921年交通大学成立后，任交通大学校长；张煜全，耶鲁大学硕士，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外交部参事、秘书，1918~1920年任清华学校校长；郑洪年，1909年任职于交通部，辛亥革命后任京汉铁路局局长、京奉铁路局局长、京绥铁路局局长，与徐世昌交往甚密；陈垣，1913年当选众议员，1914年国会解散后潜心学术，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关赓麟，进士，曾赴日留学，归国后历任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联运处处长、编译处处长，铁路总局提调，京汉铁路会办、总办、局长，川粤汉铁路督办，铁路部参事，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交通法规编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业务司司长兼联运处处长，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等，曾任北平交通大学及铁路大学校长；黄郛，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于清军谘府，武昌起义后参与上海光复，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1912年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1915年参与反袁，与北洋政客交往甚密，1921年担任华会代表团顾问。^② 不难看出，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中这些人士与北京政府关系甚为密切，这就为上海一些团体代表怀疑联合会抵沪代表的动机埋下了伏笔。

二 联合会及抵沪代表筹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早在华会前，驻英公使顾维钧就要求国内“各本良心，共趋正轨，消阂墙之衅，捐鹬蚌之争，群策群力，一致对外”。^③ 北京各界很早也意识到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重要性，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外交问题日趋险恶，非得合全国，一致对外，无以救亡”，号召“联合全国公私各团体，及太平洋问题各团体，共同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拟定“上海为集合地方，双十节前后为举行期日”，强调“一致表示，端在此时”。所谓一致之表示“在我国民之自身而已，南北相持，历年不决，南与南相持，北与

① 《太平洋问题讨论会近讯》，《申报》1921年9月12日，第2张（7）。

② 上述诸人履历系笔者收集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③ 《驻英公使电》，1921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35页。

北相持，且方兴而有之艾，要皆当局个人利害冲突之问题，于我国民无与也。我国民对内本无畛域之分，对外更无异同之见”，并将“此次外交之成败，以吾国统一与否为断”联系起来，标售“政府之应否统一，固不可知，我民自初即无不统一之说，国民对外一致，即国民表示统一之特征”。总之，“分之则神离而力薄，联之则体合而用大”。^①至于为何选择上海为“集合地方”，其原因主要在于“上海方面有志者起而号召，较北京之一隅者，为力较厚，影响较大”。^②但联合会也表示其一贯主张即“系专论外交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事件”。^③

联合会的通电发出后不久，其他省份纷纷予以响应，如浙江宪法会议立即通电表示赞成在上海成立全国国民外交大会。^④在北京，10月5日，联合会开始讨论推选代表赴沪接洽事宜，并议决推举蔡元培赴上海接洽，各团体各选一人为赴沪代表。^⑤10月11日，联合会致电上海商教联合会，表示北京“各团体代表业已分别选出，不日出发”。但蔡元培因“适以校务未克”，并未赴沪。^⑥具体而言，北京各团体分推赴沪的代表有蔡元培、朱佩珍、黄镇槃、刘揆一、饶汉祥、张一麐、张季鸾、杜含章、林景澍、刘冕执、孙绳武、萧治品、李治东、梁锡先、俞诚之、周渤、刘阳生、罗正纬、陈懋鼎、李景龢、王毅、罗正谊、钟少梅、汪瀚、任峰、朱鸿基、徐汝梅、邱豫萱、陈蓉光、汪砺峰等，三十余人。^⑦但并非所有的被推代表均予前往，仅有罗正纬、向乃祺、罗正谊、张季鸾、朱宝三、黄镇槃、郑洪年、徐汝梅、杜含章、郭葆珍、孙燕贻等二十余人抵沪。^⑧检阅当时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赴沪代表所在团体每逢重大事件大都曾赴外交部询问外交情势、表达外交意见，政府也曾予以充分配合。按此可以推测，这些代表从北京政府及外交部获得一些可靠外交信息亦应属情理之中，正因这些沟通，他们对北京政府的反对似乎也没有其他地方强烈，甚至还予以一定程度的同情与理解，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想象。

① 《北京发起全国外交大会》，《申报》1921年10月1日，第3张（10）。

② 《国民外交大会之掀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7日，第3张（10）。

③ 《北京发起全国外交大会》，《申报》1921年10月1日，第3张（10）。

④ 《浙江省宪法会议纪事十五》，《民国日报》1921年8月19日，第6版。

⑤ 《昨日国民外交联合会开会》，《晨报》1921年10月6日，第2版。

⑥ 文心辑录《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第7页。

⑦ 《各团体选出之国民外交大会代表》，《晨报》1921年10月20日，第2版。

⑧ 虽抵沪代表由各自所在团体分别推选，但这些团体大都宣布加入联合会，笔者为行文方便，在此将抵沪的北京各团体代表统称为联合会代表。

联合会代表抵沪后立即与上海各界接洽，商讨大会成立事宜。但一开始，上海一些团体代表就对这些北京代表持怀疑态度，而直接导致不信任的原因就是联合会本身成分较为复杂，除学界名人外，其中不乏政府人士、在野名流，大都与北京政府、南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远处上海的各团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势下很难不怀疑北京代表的动机。联合会代表罗正谊、向乃祺、罗正纬等抵沪后除介绍联合会成立缘由及大致过程外，还说明颜惠庆不就首席代表原因。当时，盛传联合会为与总统徐世昌有关系的李景铤所操纵。如前所述，李景铤参加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时就坚决反对直接交涉，10月11日，参加第四次全体大会时，作为执行委员的李景铤除报告蔡元培因事未能即日赴沪情形、各团体的提案外，仅仅是提出关于山东胶澳问题宣言书案，决定临时组织审查会对其予以审查，^①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李景铤系遵循北京政府的意旨行事，同时，盛传其控制联合会也略有牵强。针对此种盛传，联合会代表主动予以申辩，表示：“此说有妨碍会务进行，不能不辨，查李景铤、杨天骥同为外交后援会之代表，此会虽与政府有关系，然同为五十余团体之一，万无此等能力，不过系根据会章，照到会名册次序轮流，任一度之主席而已，今李亦为代表之一，不日可到。”并向上海记者强调：“该会事事公开，事事公决，团体多而且大，无论何人，不仅不能操纵把持，并不能独持异议，以犯嫌疑，且互相监督，互相维持，纯粹以国民公意，决定一切，如果推广及于全国，国民之真精神，亦不难于实现。”^②虽然说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的背景让时人引起联想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李景铤于10月26日与张耀曾、李治东等人赴外交部询问外交情形时，就要求颜惠庆公布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谈话之真相及政府与日本非正式商议内容等等。^③据此，《晨报》的报道所塑造的李景铤反而是监督政府外交的国民外交代表形象，与盛传有很大出入。尽管如此，李景铤控制联合会的盛传的确影响了与上海一些团体代表之间的合作。与上海各界共商办法时，联合会代表因此还不得一直强调：“非合全国之力，为更大之群众运动，不足以有希望”，同时也承认：“北京团体本多，惟性质原极复杂”，但强调：“此次之事，则商学政团，既有联络，步调齐一，实缘所受刺激至深，故对外完全统一。”联合会代表为此还商定分头接洽各界之时，“务以公开普遍为要义，期于

① 文心选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第7页。

② 《北京外交联合会代表之谈话》，《申报》1921年10月26日，第4张（14）。

③ 《颜惠庆对于鲁案之表示》，《晨报》1921年10月27日，第2版。

多数有力人物，出面主持，更进而促使各省各界之兴起，参加此项对外的国民大运动”，并力邀上海各报记者“共策进行”。^①接洽时，他们也一再表示代表来沪“并非完全自动，盖一面因商教联合会曾一再电促其来沪，筹商大会进行办法”，因而“特奉此践约”，“至国民外交大会如何组织，并无成见，此种问题，为国民全体之责任，究竟如何办理，请本埠各界共同主持”。^②所言其实意在说明此次来沪也并非一相情愿，而是应各界之邀前来共同组织，目的单纯，即一致对外。

联合会代表的诚意获得了上海各界很大程度上的谅解与支持。连国民党人叶楚仓也对罗正纬所言“极表同情”。尽管对北京政府业已失望，但大多数代表还是认为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应“实纯系对外问题，代表来沪，亦系以国民资格，与其他绝无丝毫关系”，“目的宜单纯，即取消日本二十一条是也”。^③总之，北京代表团抵沪后，“表示光明磊落之态度，各界极为谅解，无论何方面，皆已纷纷加入，为同一之运动”。罗正纬又提出：“一，本国民外交之原则，集合全国国民公意，对外为一致之主张及行动，表示国民同一之精神，以巩固国际之地位。二，本共和国家主权在民之原则，全国国民直负对外之责任，以养成爱国之热忱。三，国民以诚意互助之精神，尊重公共之目的，容纳各方面正当之主张，导入相当之轨范，化除一切畛域，力矫国民互相攻毁之风。四，防止挑拨感情，被人利用起见，事事公开，事事公决，以绝对平民式之运动，排除一切障碍，务使真正民意，从此实现。”^④关于内政外交之关系，一些团体如全国商会总事务所干事江湘浦也提出“不涉内政”，^⑤与联合会的“一致对外”颇符。

然而，就在积极筹备大会之时，一些联合会在京代表却迟迟不来上海。10月22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旅京福建同乡会请郑孝胥作为联合会代表赴上海参加大会，但郑以“胥有疾，请另举”而拒绝。^⑥旅京福建同乡会后又电促，“敬恳力疾赴会，以副乡人喁喁之意”。27日，郑孝胥仍以“有疾”复电推辞。^⑦对一些代表迟迟不赴上海的原因，北京代表张维城道出了实情：“惟其中团体，多因经济竭蹶，代表旅费，难于

① 《国民外交大会之发轫》，《申报》1921年10月27日，第4张（14）。

② 《国民外交大会之由来》，《申报》1921年10月28日，第4张（14）。

③ 《国民外交大会茶话会纪盛》，《申报》1921年10月29日，第4张（14）。

④ 《罗正纬组织外交大会之谈话》，《申报》1921年11月3日，第4张（14）。

⑤ 《国民外交大会筹备三志》，《申报》1921年11月1日，第4张（14）。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3，第1883页。

⑦ 《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1884页。

筹措，以致迟迟其行，至联合会对于外交上之主张，因各团体均提出意见，审查破费时间，且为郑重起见，不得不加以精密的研究，故代表来沪时，不及携带，大约日内即可即来”；还有意识地强调：“北京各团体此次组织国民外交联合会，以及发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之宗旨，纯为一致对外起见，外间谣言，殊不可信，惟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系一种群众运动，兹事体大，须赖舆论及各界共策进行。”^① 显而易见，其言有针对此前谣传的意味。直到11月28日，张维城北上之时还在力劝联合会代表赴沪。^② 另一方面，上海各团体的不同意见、整体上的反应较慢也影响了大会筹组进度。到10月底，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各路商界联合会等还试图按北京办法先行组织上海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进而为大会召开做准备；^③ 北京推郑洪年、张维城、罗正纬、张季鸾为筹备员后，上海各团体签名加入者却“未及半数”，且“尚未推定筹备员”；上海华侨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两会还对组织方法“尚有筹议”；上海太平洋协会因“一时不易召集代表”导致尚未决定是否加入大会；尽管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准备加入，但“因手续未完备，迄未通过”。^④ 此外，11月初，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一些省区代表前往也涣散了力量。^⑤ 由于华会即将召开，抵沪联合会代表为此致电尚在京代表“赶速来沪”，又电促广东全国教育会代表“于散会后，再齐赴上海，为共同之活动”。^⑥

几经波折之后，11月11日，17省118个团体的代表组织召开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由此可见，上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是在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推动下成立的，联合会代表是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者。上海一些团体因联合会代表与北京政府的万缕千丝联系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北京代表不得不多方接洽、解释以示诚意，消除疑虑，才获得了上海一些团体的支持。

三 代表派遣的争论与南北政府的互动

如前所述，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视野中的“南北一致”，强调

① 《北京代表之谈话》，《申报》1921年11月1日，第4张（14）。

② 《外交大会今日开会》，《民国日报》1921年11月30日，第3张（10）。

③ 《国民外交会进行消息》，《民国日报》1921年10月30日，第3张（10）。

④ 《全国外交大会筹备四志》，《申报》1921年11月2日，第4张（14）。

⑤ 《全国教育会代表抵粤》，《民国日报》1921年11月2日，第2张（6）。

⑥ 《国民外交大会茶话会纪盛》，《申报》1921年10月29日，第4张（14）。

的是南北国民一致对外，它虽然声称“南北相持”与国民无关，但实际上很希望南北政府抛开分歧、一致对外。这一点，集中反映在联合会要求北京政府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共派代表出席华会上。

早在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成立之前，北京一些团体就对派遣代表一事极为关注。叶恭绰、陈振先组织的太平洋问题讨论会认为，代表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为全国大多数国民所赞同者。（二）熟谙外交，富有学识经验（外交官应具备具之资格，如精通英语等当然在内），得国际之推重者。（三）未有丧权辱国之行爲者。”^① 8月12日，外交部刁作谦、钱泰司长接见一些代表时表示，对于代表问题，“政府极重视舆论，将须视舆论为从违”，并将通电各省省长征求意见，强调“不分南北，各省均有，以期一致对外”。^② 针对北京各团体一致主张“南北共派”，外交部钱司长接见太平洋问题讨论会代表蔡鸿业时表示：“与南方接洽一层，目下尚无何等效果，孙氏前本决定单独派遣代表，嗣因美国方面空气不佳，表示不予承认，故又有主张南方宁可不派遣代表，不顾与北方协定派遣之说，好在此时各国代表亦尚未正式产出，吾国暂不发表，亦属无碍。”^③

其实，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一开始就对华会极为重视，认为“今此一线生机，正我正式政府独一无二之机会，所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裁减军备实行民治者，尤为我国生死之关系，应请即日开会讨论议决，请政府速派得力代表迅赴列席，实为至要”。^④ 广州还发起成立了太平洋讨论会，汪精卫、邹鲁分别担任正副会长。该会虽声称“专门讨论太平洋各问题，而谋造成对于太平洋会议全国一致之舆论为宗旨”，实际却是为南方政府舆论造势。^⑤ 8月30日，南方政府开会议决：北京政府未经国会同意不能代表中国，足以代表中国的“只有合法国会所产出之政府”，代表“当然由正式政府命令出之”，即由南方政府派遣；^⑥ 又声明：“广州代表若不参与会议，则大会关于中国之决议案，无一将受众承认有任何效力。”^⑦ 北京

① 《国内研究太平洋问题各团体之进行》，《晨报》1921年8月10日，第2版。

② 《外部对太平洋问题之谈话》，《申报》1921年8月16日，第3张（11）。

③ 《记北京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申报》1921年9月6日，第3张（10、11）。

④ 《复国会非常会议文》，1921年8月底，《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594页。

⑤ 《广东发起太平洋讨论会》，《申报》1921年8月16日，第3张（11）。

⑥ 《太平洋会议与西南》，《申报》1921年8月31日，第3张（11）。

⑦ 《南方之太平洋会议主张》，《申报》1921年9月8日，第3张（10）。

的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有鉴于此，通电南北政府，要求“南北即日平息内争，尽释前怨，并于最短期间，迅筹一统一之方，然后一致对外，以救危亡”。^① 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也通电表示：“南方执政诸人，夙以民意为标准，此次太平洋会议，议起民意，均谓宜一致对外，而道路宣传，南方方向美国否认北方代表，诚不知其用心何居，本会非谓南方不应派代表，但谓代表者代表中华民国，既非代表北方，亦非代表南方，故宜由南北二政府共同协商派出代表，若南北各不相谋，各派代表，则中华民国在会议中，显然为两国，使仇我者更有辞可藉，而我代表在会议中发言之力量，亦较薄弱，是非破坏北方，直是破坏国家也。”并声明，南方政府“果如道路所传，是南方对于国家而捣乱，民意决不附之，纵得外国之承认又何益。且日人不尝以我国分裂为辞而欲摈我国之参加乎。南政府果否认北政府所派代表，不啻助日人张目，国人将谓南政府受日人运动，其又何辞自解，此本会欲为南政府正告者也。”^②

作为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一职的蒋梦麟此时受上海总商会推举赴广州说服孙中山。孙中山为缓解国民不满情绪，借机进行解释：“苟南方此时加入中国代表，将来各国议决中国之事，谓南方亦有代表在场，而北方代表没有承认所议，则南方代表更难独任反对。况请帖乃邀北方代表者，即南方加入，亦不过为北方之附庸。不如南方不出代表，只否认有效，或可与中国以平反议案之机。”^③ 孙中山的解释收到一定效果，蒋梦麟对此表示谅解。蒋梦麟抵达上海后，在各种场合说明南方虽不派代表，但“亦不加北方代表以困难，惟声明有违背民意时，誓不承认耳”，并对南方焚烧鸦片、市政建设、革新精神大加褒扬。余日章据此认为：“实有宣传之价值”，穆藕初因此希望“报界勿再为‘南北政府一丘之貉’的谬论，国民亦各赞助良政府以推翻恶政府”。^④ 针对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呼声，胡汉民则辩解道：“民国九年来之痛史，皆为一致对外四字所误，此次太平洋会议，须将南北一致四字，一刀剖断，方有讨论的余地，凡何种会议，其标题无不堂皇，内容无不诡秘，我南方切不可为一致二字所利用，贸然派出代表，与北方一致。”^⑤ 伍廷芳复电北京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时更是直接表示：“惟观北庭，现筹秘密借款如故，国家破产

① 《太平洋问题讨论会近讯》，《申报》1921年9月12日，第2张（7）。

② 《后援同志会之紧急通电》，《晨报》1921年9月15日，第2版。

③ 《与蒋梦麟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00页。

④ 《各公团延送两代表记》，《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0日，第3张（10）。

⑤ 《广州讨论太平洋之国民会议》，《申报》1921年9月30日，第3张（11）。